

【海外儒学研究前沿丛书】

主编◎安乐哲 杜维明
执行主编◎彭国翔

切中伦常

《中庸》的新诠与新译

安乐哲 郝大维◎译

翔◎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海外儒学研究前沿丛书】

主编◎安乐哲 杜维明 执行主编◎彭国翔

切中伦常

《中庸》的新诠与新译

安乐哲 郝大维◎著 彭国翔◎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切中伦常:《中庸》的新诠与新译 / 安乐哲、郝大维著, 彭国翔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2

(海外儒学研究前沿丛书)

ISBN 978 - 7 - 5004 - 9224 - 5

I. ①切… II. ①安…②郝…③彭… III. ①中庸—研究②
中庸—英语—翻译 IV. ①B222. 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08225 号

责任编辑 鉴传今
责任校对 韩天炜
封面设计 回归线视觉传达
技术编辑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4.5 插 页 2

字 数 242 千字

定 价 3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外儒学研究前沿丛书》总序

揽彼造化力，持为我神通

彭国翔

正如儒学早已不再是中国人的专利一样，儒学研究也早已成为一项全世界各国学者都在参与的人类共业。“夜郎自大”的“天朝心态”不可避免地导致固步自封，落后于世界现代化发展的潮流。学术研究如果不能具有国际的视野，“闭门造车”充其量也不过是“出门合辙”，难以真正推陈出新，产生原创性的成果。如今，理、工、农、医以及社会科学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无不步西方后尘，已是无可奈何之事，不是“赶英超美”的豪情壮志所能立刻迎头赶上的。至于中国传统人文学包括文、史、哲的研究，由于晚清以至 20 世纪 80 年代不断激化的反传统思潮在广大知识人群中造成的那种“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托钵效贫儿”的普遍心态，较之“外人”的研究，也早已并无优势可言。中国人文研究“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再出发”，至少在中国大陆，已是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的事了。

依我之见，现代意义上中国人文学研究的鼎盛时期是在 20 世纪 20—40 年代。尽管那时的中国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但学术研究并未受到意识形态的宰制，一时间大师云集、硕儒辈出。而那些中国人文学研究的一线人物，除了深入中国古典、旧学之外，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兼通他国语文，能够及时了解和吸收域外中国人文研究的动态与成果。所谓“昌明国故，融会新知”，不但是“学衡派”诸君子以及当时那些大师硕儒的标的，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恰恰是他们自己学行的体现。1949 年鼎革之后，虽然有一批人文硕儒避地海外，于“花

颇有重叠之处。并且，《孟子》和《中庸》也都同样表示了对于一系列早期文化中心人物的敬重，这些人物是被作为效法的榜样的。和早期的儒家经典诸如《论语》的另一个共同之处在于，新发现的有关子思的材料、《孟子》以及《中庸》，都广泛引用了《诗经》中的章句，将其作为一种经典权威的资源。这些章句既解释被讨论的哲学观点，也相应的为那些哲学观点所解释。

事实上，和《论语》、《孟子》以及《荀子》一样，《中庸》更多的诉诸《诗经》而非任何其他的经典，以之作为其训诫的一种权威。^①反省《中庸》是如何运用《诗经》来强化其哲学观点，是一项有趣的工作。

战国与秦朝之间，那些非经典的诗歌经历了一个历史架构的过程，对于这一过程发生的方式，史嘉伯（David Schaberg）进行过探讨。^②注释者们觉得，虽然一首诗歌通常非常隐晦甚至难以理解，但是，它仍然是一种破解密码的交流工具。并且，只有将其置于一种有关某些令人感兴趣的人物或事件的特定历史轶事之中，这种交流工具才能够被理解和欣赏。只有在歌手和听众心灵相通、彼此共鸣的情况下，诗歌才会产生其隐含的信息。

在《中庸》和该时期其他一些哲学文献中，看起来也发生过类似的过程。其中，像那些被收集在《诗经》中的经典性的诗歌——它们大概更为广泛地被人们记忆和吟诵，通过用以加强论证某个特定的哲学观点，从而得到了解释。于是，作为一种古代意义的共享储备，这些诗歌在一种过程中得到了阐明，而这一过程使得作者们可以宣称拥有了传统的威望，由此来论证自己的论断。

对于论证哲学观点来说，诗歌是一种特别有效的补充。对此，有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对于哲学文献的读者来说，诗歌是广为他们所知的，因而也就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其次，众多没有作者的诗歌来源于人们的日

① 马克·路易斯（Mark Lewis）做了不少努力向人们展示，在早期文献中，不同的哲学文本是如何使用《诗经》的过程。参见其《早期中国的书写与权威》（*Writing and Authority in Early Chin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9），第163—176页。

② 参见史嘉伯（David Schaberg）《早期中国的诗歌与历史想象》（*Song and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Early China*），《哈佛亚洲研究季刊》（*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1999年第59期，第2页。

者的研究亦步亦趋的风气。西方学界对于中国人文的研究稍有风吹草动，中文世界都不乏聪明才智之士闻风而起。但各种方法、模式和理论模仿得无论怎样惟妙惟肖，是否能够施之于中国人文学的研究对象而“有用武之地”，不至于生吞活剥，最终还是要取决于研究对象本身的特质。所谓“法无定法”，任何一种方法本身并无所谓长短高下之分，其运用的成功与否，完全要看是否适用于研究对象。譬如，在北美的中国史研究中，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的研究目前似乎已经式微，起而代之的社会史（social history）、地方史（local history）等研究取径颇有独领风骚之势。但是，如果研究的对象是宋明时代一位或一些与其他各地学者经常保持联系的儒家知识人，那么，即使这位儒家学者多年家居并致力于地方文化的建设，这位或这些学者与其背后广泛的儒家士人群体的互动，以及那些互动对于这位学者观念和行为所产生的深远影响，都需要充分考虑，这就不是单纯的地方史的研究取径所能专擅的了。再者，如果要了解这位或这些学者思想观念的义理内涵，社会史的角度就难免有其盲点了。如今，中国学者对于中国人文学的研究，所考虑者似乎已经不是对于海外研究成果缺乏足够的信息，反倒正是由于对各种原始文献掌握不够深入而一味模仿西方学者研究方法、解释模式所产生的“邯郸学步”与“东施效颦”。中国人文学研究似乎正在丧失其主体性而落入“喧宾夺主”的境地尚不自知。

然而，面对这种情况，是否我们就应该采取“一刀两断”的方式，摈弃对于海外中国人文学术的了解和引进，如此才能建立中国人文研究的主体性呢？显然不行，那势必“自小门户”，不但不能接续20世纪20—40年代所形成的良好学统，反而会重新回到“画地为牢”、“固步自封”的境地。在“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情况下，“天朝心态”虽然是无知的产物，但毕竟还是真实的自得其乐。而在全球化的时代，试图在与西方绝缘的情况下建立中国人文学术的主体性，不过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作祟。这种情况下的“天朝心态”，就只能是掩盖自卑心理而故作高亢的惺惺作态了。

所谓“揽彼造化力，持为我神通”。只要我们能够充分掌握中国人文学术的各种原始文献，植根于那些文献的历史文化脉络，深明其内在的问题意识，不丧失自家的“源头活水”，在这种情况下去充分了解海外的研究成果，就只嫌其少，不嫌其多。西方的各种理论和方法，也就

只会成为我们进一步反思自我的资源和助缘，不会成为作茧自缚的负担和枷锁。

· 以上所说，正是我们选编并组织翻译这套“海外儒学研究前沿丛书”背后的考虑和自觉。是为序。

中文版新序

安乐哲

作为早期中国宇宙论的总结,《易经》将人类的经验界定为“变通”。本书中译本的出版,正逢人类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已然发生的一个巨大变迁就是:21世纪已经进入到一个全球相互依存的新时代。人类作为一个物种所面对的日益增长的各种复杂问题,不再只是单纯的国家利益。诸如全球变暖、全球流行疾病的威胁、空气与水污染、宗教极端主义、萎缩的能源储备、环境恶化等等问题,并不尊重国家的边界,而是在全球蔓延。我们要么一道来解决这些问题,要么一道沉沦下去。

我们需要在一个全球的视野中去思考,与此直接相关的还有第二个重要的方面。那就是:随着中国过去三十年来的起飞,在一个全球相互依存的时代,影响我们所有人的世界经济和政治秩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中国的经济与政治增长对于全球的影响如何?这一点相对比较容易追索其轨迹,但是,文化方面又怎么样呢?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我希望读者能够把卷自问:在这种急剧变化的情况下,以家庭为中心的儒学价值会不会促进一种新的世界文化的秩序?在追求“礼之用,和为贵”的过程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儒学正是推崇这样一种价值的文化。在儒家看来,个人由各种关系组成。个人被理解为处在各种关系之中,并且在各种独特的、交互性的关系模式下得以滋养成长。这样一种对于个人的理解与那种离散个体(discrete individuals)的模式适成对照。而将个人理解为离散个体的观念则是自由民主主义(liberal democracy)的基本特征。对儒家来说,道德生活存在于家庭与社群关系之中,这种关系的模式是深厚并且彼此密切交织在一起的。儒家的这种看法会不会改变我们的文化世界?对于一种新的文化秩序来说,儒家这种对于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相互依赖的理解又是否有其贡献呢?

英文版前言

在本书有关《中庸》的讨论中，我们尝试提供一种资源，既是对有关中国思想的学者，也是对那些也许是初次接触中国哲学文献的师生。后者也许一开始会觉得，伴随本书对《中庸》翻译得较为细致的学术工具（scholarly apparatus）有点儿令人胆怯。但是，我们希望，对那些不熟悉中文者，我们可以提供足够的指导，使他们努力在西方脉络中了解中国思想的这样一种遭际中，获得对这种挑战的富有成果的理解。

本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中庸》文本的研究，对于了解《中庸》这部文献的历史及其英文翻译的历史，该部分探讨了某些较为专门性的问题。其中，我们诉诸于最近中国的考古发现，来帮助我们确定《中庸》在其思想脉络（intellectual context）中的定位。第二部分是对《中庸》提供一种哲学性和宗教性的诠释。第三部分提出了《中庸》一书中所涉及的一些重要的术语，并对这些术语的含义进行了解释。对于那些将本书作为课堂教材的教师来说，这些术语的解释尤为有帮助。因为这些术语在《中庸》的论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本书的解释则简明扼要。第四部分则是对《中庸》的英文翻译。在本书的翻译中，我们对于那些较为困难的翻译问题有足够的警觉，无论对于专家还是新手，我们都提供了充分的诠释。

有意对《中庸》提供一种与众不同的哲学性的诠释，对此，我们应当作些说明。我们的用意不在于使我们的诠释与其他一些可能的诠释取径（如文字学或者历史学的取径）形成对立。毋宁说，我们意在表明，对于《中庸》这部文献在语义上和观念上的微妙之处，我们保持了格外的关注，为的是说明它在古代中国文献中的核心地位。正如我们将会在本书第二章详细讨论的那样，直到最近，对于一些诠释性的文献，诸如《中庸》、《论语》、《道德经》以及《庄子》，由于将其中所蕴涵的慧识洞见翻译成恰当的西方语汇困难重重，它们所能够嘉惠于我们的，远较我们实

际所获得的为多。因此，我们在此宣称提供一种哲学性的诠释，其意义也就等于说，我们试图以一种我们认为是最切中肯綮的方式来对待这部文献。

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同意陈荣捷对《中庸》的如下评论：“《中庸》是一部哲学作品……在整个古代儒家的文献中，它或许是最具哲学性的。”^① 并且，我们试图将这一重要的哲学文献呈现出来，所采用的方式是允许西方的哲学家们能够以一种富有成果的方式参与其中。我们希望这种努力将不仅论证这部文献本身在哲学上是引人入胜的，并且将给西方的哲学家们以及其他知识分子提供切近一整套诠释与论证的途径，对于那些中国和西方的思想家们共同的问题和关注，这一整套诠释与论证提供了许多崭新的睿识与洞见。

^① 陈荣捷：《中国哲学资料书》（*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第96页。

目 录

中文版新序	(1)
英文版前言	(3)
第一章 《中庸》文本的研究：文献与义理	(1)
一 文献的研究	(1)
(一) 《中庸》和“思孟学派”	(1)
(二) 子思与“五行”学说	(7)
(三) 《中庸》：一部合成的文献	(12)
(四) 《中庸》成书的断代	(14)
(五) 子思其人	(15)
二 《中庸》的义理论释	(18)
(一) 《中庸》首章的再分析	(18)
(二) 为什么“中庸”不是“Doctrine of the Mean”	(20)
第二章 比较视域下的《中庸》新诠：哲学与宗教性的	
取径	(22)
一 《中庸》的重要性	(22)
二 翻译的一些问题	(24)
(一) 界定“哲学”文本	(24)
(二) “焦点”与“场域”的语言	(26)
三 “气”和关联性的宇宙论 (Correlative Cosmology)：	
《中庸》的诠释脉络	(40)
四 《中庸》的核心论证	(49)
(一) “诚”与创造性 (Creativity)	(54)
(二) “诚”、“性”和“情”	(59)

(三) 作为主导性隐喻的家庭	(62)
(四) 《中庸》中的“礼”	(64)
第三章 《中庸》重要观念通释	(80)
一 诚	(80)
二 道	(82)
三 德	(83)
四 和	(84)
五 教	(85)
六 君子	(86)
七 礼	(88)
八 命	(90)
九 气	(91)
十 情	(91)
十一 仁	(92)
十二 善	(93)
十三 圣	(94)
十四 圣人	(95)
十五 天	(97)
十六 物	(99)
十七 孝	(99)
十八 心	(100)
十九 性	(101)
二十 义	(102)
二十一 智	(103)
二十二 中	(104)
二十三 中庸	(105)
第四章 《中庸》的英文新译	(107)
附录一：“礼”与古典儒家非神论的宗教思想	(145)
附录二：儒学与杜威的实用主义：一种对话	(167)

附录三：活出此生的意义：创造性的真谛	(196)
征引与参考文献	(213)
译后记	(219)

第一章 《中庸》文本的研究:文献与义理

一 文献的研究

(一)《中庸》和“思孟学派”

孔伋（公元前483—前402）是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的孙子。他的父亲伯鱼在《论语》中出现过2次。孔伋，字子思，而他最为人所知的就是“子思子”。在早期的记录中，子思的名字与《中庸》相关。另外，除了《中庸》以外，在编辑于汉代的《礼记》中，还有“表记”、“缙衣”和“坊记”这三篇文章也与子思有关。

一直以来，子思只是被学界假定为《中庸》的作者。而目前，子思作为哲学家的地位正在变得日益重要。由于最近一系列的考古发现，作为《论语》中所反映的孔子学说以及《孟子》、《荀子》中所反映的古典儒学的早期演化之间的失落的环节之一，子思得以走出历史的迷雾。不过，子思只是那些失落环节的其中之一，因为在那些考古发现中，出现了很多的文献，这些文献和早期儒学传统中的其他几个我们熟知的重要人物有关。除了被当代学者打算归诸子思的那些文献资料极为丰富之外，新的出土材料中还有名为“曾子”、“子路”和“颜渊”的文献。所有这些文献全部以出现于《论语》中的重要孔门弟子而命名。

子思不仅仅是孔子的孙子，而且是曾子的学生。在《论语》的后半部分，曾子是重要的人物之一。在孔子死后，曾子也是孔门后学中名列最优秀的八大儒生之一。据《史记》记载，子思晚期的弟子之一是孟子的老师。正是由于子思和孟子之间的这一直接的历史关联，由曾子所传下来的这一学派常常被称为“思孟学派”。而新发现的有关子思的文献和《孟子》之间在哲学思想上的共鸣，则更加印证了“思孟学派”的内在联系。在后来的儒学传统中，正是这一谱系被认为是儒家的正统传承。

在尊重《论语》以及使用标准的儒学术语方面，《孟子》和《中庸》

果飘零”之际，使现代中国人文研究的传统得以薪火相传，但毕竟难以维持以往的鼎盛了。如今中国大陆人文研究的再出发能否趋于正途、继往开来，在一定意义上，其实就是看能否接得上 20 世纪 20—40 年代的“学统”。

接续并发扬现代中国人文研究学统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及时了解和吸收海外相关的研究成果。对此，中国人文学界的知识人其实不乏自觉。单纯西方学术著作的引进自清末民初以来已经蔚为大观，这一点自不必论。海外研究中国人文学术的各种著作，也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渐成风潮，以至于“海外汉学”或“国际汉学”几乎成为一个独立的园地。不过，对于“海外汉学”或“国际汉学”本身是否能够构成一个独立的专业领域，笔者历来是有所保留的。很简单，海外有关中国人文研究的各种成果，无论采用传统的“义理、考据、辞章”或“经、史、子、集”，还是现代的“文、史、哲”，都必然系属于某一个特定的学科部门。而鉴别这些研究成果的高下、深浅和得失，必须得是该学科部门的当行人士，绝不是外行人士所能轻易置评的。譬如，一部西方学者用英文撰写的研究苏轼的著作，只能由那些不仅通晓英文同时更是苏轼专家的学者才能论其短长，我们很难想象，在文学、历史、哲学、宗教、艺术等人文学科的部门和领域之外，可以有一个独立的“海外汉学”或“国际汉学”。如果本身不是中国人文学科任何一个部门的专业人士，无论外国语文掌握到何种程度，都很难成为一位研究海外或国际汉学的专家。所谓“海外汉学”或“国际汉学”并不能构成独立于中国人文学之外的一个专门领域，其意正在于此。事实上，在海外，无论“汉学”还是“中国研究”，正是一个由包括历史、哲学、宗教、文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各门具体学科构成的园地，而不是独立于那些学科之外的一门专业。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要想真正了解和吸收海外中国人文研究的最新成果，还需要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了解和吸收的主体自身，必须是中国人文学相关领域的内行人士，对于相关海外研究成果所处理的中国人文课题的原始文献，必须掌握娴熟，了解其自身的脉络和问题意识。只有如此，了解和吸收海外的研究成果，才不会导致盲目的“从人脚跟转”。否则的话，非但不能对海外中国人文研究的成果具备真正的判断力和鉴赏力，更谈不上真正的消化吸收、为我所用了。

当前，在中文世界中国人文研究的领域中，也出现了一股对西方学

常生活。用史嘉伯的话来说：诗歌本身就是“彻底和不可控制的真实性的一种表现。”^①歌唱行为中的自发性和真诚在于这样的事实：即诗歌大都常常要么是批判要么是赞扬——有时是对于压迫而迸发出的不可压抑的反抗，有时是对于善行自然公开流露的赞许。当一种哲学文献采取诗歌的形式，以强烈的感情表现出来之时，它就充分利用了读者们那样的一种设定：诗歌是不会说谎的。因此，引用诗歌就不但可以阐明观点，而且提高了其真实性。

同时，诗歌还会使论证变得生动而引人注目。通过将较为概括和抽象的论断具体化，并将其定位于特定的历史情境之中，诗歌又会使论证变得富有情感。因此，在哲学文献中被恰当安置的诗歌不仅赋予哲学家的主张以真实的力量，而且给那些主张注入了感情色彩。

除了共同广泛征引《诗经》这一特征外，在《论语》、《孟子》和《中庸》之间，还有另外一个直接的关联不应当被忽略。我们还能够作出如下的论证：作为《中庸》一书的题目并且在该书前十一章中反复出现的“中庸”（*focusing the familiar*）一词，是这种非常深奥的哲学术语的一种详细阐述。除了《论语》第6篇〈雍也〉第29章如下的一段话。在现存的其他的文献中，“中庸”这个词几乎是找不到的。

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The Master said: “The excellence required to focus the familiar is of the highest order. That it is rare among the people is an old story.”

在《中庸》第3章中，《论语》的这段话几乎是被一字不差地引用了。这一事实，对于上述假设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中庸》和《孟子》的联系更加复杂。在《中庸》中，被广泛发展的最根本和最重要的观念之一，就是“诚”这一概念的拓展和详细阐述。习惯上，“诚”意味着“诚实”（*integrity*）或者“真诚”（*sincerity*）这样一种情感。但是，在《中庸》中，“诚”已经逐步地开始拥有了宇宙论的意义。“诚”表达的是人们对于“宇宙创造性”（*cosmic creativity*）这一不断进程的参与。《中庸》第25章中很清楚地表达了“成”（*to com-*

① 史嘉伯：《早期中国的诗歌与历史想象》，《哈佛亚洲研究季刊》，第337页。

plete) 与“诚”(creativity/integrity/sincerity)的同根性:

诚者自成也。……诚者非自诚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

Creativity is self – consummating… But creativity is not simply the self – consummating of one’s own person; it is what consummates events.

“诚”字在《论语》中也曾经出现过，但是，并没有在“宇宙创造性”的扩展的意义上被加以使用。

在1993年出土的郭店竹简中，有一篇文献暂时被命名为《成之闻之》。其中有一段话被当代学者郭沂修订如下：

是以君子贵成之。

It is for this reason that exemplary persons prize creativity.

郭沂发现，在《成之闻之》和《中庸》之间，存在着很大程度的共鸣。并且，在《成之闻之》中的“成之”以及《中庸》中第20至26章中的“诚”和“诚之”之间，也存在着直接的联系。在强调《中庸》和《成之闻之》这两篇文献之间这种假设的联系时，我们可以发现，二者同时暗示了《中庸》第25章中“诚之为贵”的观念：

是故君子诚之为贵。

It is thus that, for exemplary persons, it is creativity that is prized.

基于两者在语义学和语言学两方面的共鸣，郭沂辩称，《成之闻之》其实当为子思后学所作，并且，这些子思后学对孟子有某些直接的影响。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这种“创造性”(creativity)的观念在《孟子》的“诚”中得到了表达，这也许是《成之闻之》和《中庸》二者之间的纽带。

《孟子》和《中庸》之间的直接联系并不多，但是，仅有的联系却非常重要。例如，无论在语言上还是在思想上，《中庸》第20章所表现的社会政治哲学都可以在《孟子》中找到痕迹。在《孟子·离娄上》中，我们可以看到，通过对于自己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的角色和各种人际关系